

歷史語言學研究

第九輯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歷史語言學研究》編輯部編

 商務印書館

CSSCI 來源集刊

歷史語言學研究

(第九輯)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歷史語言學研究》編輯部 編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歷史語言學研究. 第9輯/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歷史語言學研究》編輯部編. —北京:商務印書館, 2015

ISBN 978-7-100-11903-0

I. ①歷… II. ①中… III. ①語言學史—文集 IV. ①H0-0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5)第 310070 號

所有權利保留。

未經許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LISHI YUYANXUE YANJIU

歷史語言學研究

(第九輯)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
《歷史語言學研究》編輯部 編

商務印書館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郵政編碼100710)

商務印書館發行

北京市鬆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1903-0

2015年12月第1版 開本 787x1092 1/16

2015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張 17

定價:42.00圓

顧問（以漢語拼音爲序）：

貝羅貝 丁邦新 江藍生 蔣紹愚 柯蔚南 馬提索夫 梅祖麟

編輯部（以漢語拼音爲序）：

曹廣順 陳丹丹 馮勝利（特邀） 李明 羅端（特邀） 孫朝奮（特邀）
吳福祥 楊永龍 張敏（特邀） 趙長才 祖生利

本輯責任編輯：

曹廣順 吳福祥 楊永龍 陳丹丹

封面題字：

丁邦新

目 錄

從中古譯經和元白話看第二語言習得導致的語言接觸	
——以語言接觸導致的語法變化為例·····	曹廣順 遇笑容(1)
中古譯經由原典呼格的對譯所帶來的句法影響·····	趙長才(11)
論“直譯”的真正目的	
——以蒙漢、滿漢對譯文獻為例·····	竹越孝(25)
漢語單論元動詞帶論元賓語的歷史考察	
——兼論古代詩歌句法對常規句法的影響·····	洪波 徐傑(36)
近代漢語“坦言”類語用標記及其演變·····	李宗江(45)
“幹嗎”流變考釋·····	鍾兆華(54)
“疑問代詞+去”的源流及相關問題·····	陳丹丹(69)
淺談中古全濁聲母清化的語音基礎及歷史層次·····	曹劍芬(77)
半齒音日母讀音再探·····	單周堯(99)
安世高譯經頭面、五官類詞語義場初探·····	方一新 盧鷺(123)
“侃大山”“擺龍門陣”考源·····	楊琳(143)
古突厥語 TVG(V)音節結構和上古漢語的對應·····	王豔紅(150)
安多藏語的親知示證和擬測示證·····	邵明園(156)
英語被動態歷史發展研究綜述·····	劉曉林(183)
· 青年論壇 ·	
灰泰入虞的地理分布與音變過程·····	鄭偉(195)
也談上古漢語的雙及物結構	
——語義角色分析的角度·····	王誠(205)
同功能介詞在歷時中的競爭與更替·····	田春來(218)
漢語負面排他標記“除·····外”探源·····	張文(231)
再探“敗績”·····	趙修(243)

2 歷史語言學研究(第九輯)

句末助詞“矣”時、體、情態意義的轉換與演變

——以先秦至唐宋語料為依據……………姚 堯(252)

《歷史語言學研究》稿約……………(263)

從中古譯經和元白話看第二語言 習得導致的語言接觸

——以語言接觸導致的語法變化為例

曹廣順 遇笑容

提要 中古譯經和元白話是漢語史中最重要兩次語言接觸，第二語言習得導致了兩次接觸，接觸中出現了數十種特殊語法變化。第二語言習得導致的語言接觸造成語言改變的基本方式是複製，複製的對象是模型語中主要的語法特徵。第二語言習得導致的語言接觸是語言接觸研究中重要的一類，特徵明顯，是語言接觸研究的重要課題，應該引起足夠的重視。

關鍵詞 漢語語法史 語言接觸 語言變化 第二語言習得

1 導言

漢語史中有文獻記載的最重要兩次語言接觸是中古譯經和元白話，多年的研究注意到，這兩次語言接觸都和第二語言習得有關。與第二語言習得有關的語言接觸是語言接觸中重要的一類，在接觸造成變化的機制、變化產生的方式等方面都有其特色。本文擬就目前研究中注意到的中古譯經和元白話中因語言接觸而產生的特殊現象，對相關問題做一個簡單的探討。

2 中古譯經和元白話

中古譯經主要是西域僧人將梵文、巴利文佛經翻譯成的漢語，這些譯者大概可以分成三種情況，一種是西域來的僧人，到中國後學習漢語，再把佛經原典譯成漢語，如安世高、僧伽提婆：

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正后之太子也。……以漢桓之初，始到中夏。才悟機敏，一聞能達。至止未久，即通習華言，於是宣譯衆經改胡爲漢。（高僧傳，卷第一）

僧伽提婆此言衆天，或云提和，音訛故也。本姓瞿曇氏，罽賓人。……符氏建元中來入長安。……居華稍積博明漢語。……提婆乃於般若台，手執梵文口宣晉語。……更請提婆重譯中阿含等，罽賓沙門僧伽羅叉執梵本，提婆翻爲晉言。（高僧傳，卷第一）

一種是歸化的西域人，如康僧會、竺法護：

康僧會，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賈，移於交趾。先有優婆塞支謙，字恭明，一名越。本月支人，來遊漢境。初漢桓靈之世有支識，譯出衆經。有支亮字紀明，資學於識。謙又受業於亮，博覽經籍莫不精究，世間伎藝多所綜習，遍學異書通六國語。（高僧傳，卷第一）

竺曇摩羅刹，此云法護。其先月支人，本姓支氏，世居燉煌郡。年八歲出家，事外國沙門竺高座爲師。誦經日萬言，過目則能。……遂隨師至西域，遊歷諸國，外國異言三十六種，書亦如之，護皆遍學，貫綜詰訓，音義字體，無不備識。遂大齋梵經，還歸中夏。自燉煌至長安，沿路傳譯寫爲晉文，所獲覽即正法華光贊等一百六十五部。（高僧傳，卷第一）

也有少數漢人求學西域學成回國，或生活在多民族雜居的西北地方，學習過佛經原典的語言，他們用學會的梵文等語言，把經典翻譯成漢語，如竺佛念、釋法顯：

竺佛念，涼州人。……家世西河，洞曉方語，華戎音義莫不兼解。……符氏建元中有僧伽跋澄、曇摩難提等入長安，趙正請出諸經。當時名德莫能傳譯，衆咸推念。於是澄執梵文，念譯爲晉，質斷疑義音字方明。至建元二十年正月，復請曇摩難提出增壹阿含及中阿含。于長安城內集義學沙門，請念爲譯，數析研核二載乃竟。二含之顯，念宣譯之功也。自世高支謙以後莫踰於念，在符姚二代爲譯人之宗。（高僧傳，卷第一）

釋法顯姓龔，平陽武陽人。……後至中天竺於摩竭提邑波連弗阿育王塔南天王寺得摩訶僧祇律，又得薩婆多律抄雜阿毗曇心經方等泥洹經等。顯留三年，學梵語梵書，方躬自書寫。於是持經像寄附商客到師子國。……遂南造京師，就外國禪師佛跋跋陀於道場寺，譯出摩訶僧祇律方等泥洹經雜阿毗曇心垂百餘萬言。顯既出大泥洹經，流布教化咸使見聞。（高僧傳，卷第二）

佛經翻譯的主體是西域僧人，見於《高僧傳》前三卷（譯經）的佛經譯者 46 人（包括提及而未入傳的），其中西域來華的譯者 35 人；住在中國的西域僧俗 3 人（竺曇摩羅刹、曇摩耶舍 2 人入傳，支謙未入傳）；中國本土僧俗 8 人，都是比較晚參與譯經的。外來的 35 人，都是像安世高一樣，來華後學習漢語。如前面提到的安世高是“至止未久，即通習華言”，僧伽提婆則“居華稍積，博明漢語”。參與譯經的舊居中國的西域僧俗和中國僧俗，或是如法護“其先月支人，本姓支氏，世居燉煌郡。年八歲出家，事外國沙門竺高座爲師。誦經日萬言，過目則能。……外國異言三十六種，書亦如之，護皆遍學”。或如曇摩耶舍弟子法度“本竺婆勒子，勒久停廣州往來求利，中途于南康生男……入道名法度”。所以就“善梵漢之言，常爲譯語”。參與翻譯的中國人有的像佛念是“家世西河，洞曉方語，華戎音義，莫不兼解”。寶雲則是“在外域遍學梵書，天竺諸國音字詰訓悉皆備解”。（高僧傳，卷第三）這些譯者多數是外來僧人，學習漢語是其傳播佛教的基礎，更是其翻譯佛典的基本條件。少數本土僧俗，主要是公元 4

世紀之後，才參與佛經翻譯的（佛念主要翻譯工作是4世紀後期，寶雲生活於公元375-449年）。以漢語為目的語的第二語言習得，是早期佛經譯者必備的基礎條件，而第二語言習得的干擾和影響，也就勢必會出現在譯經的語言裏。^①

雖然隨着時間的推移，譯經者翻譯的技巧和水準不斷提高，但早期翻譯的語言習慣並沒有多大改變，如我們在以前的研究中指出的，一些梵文影響下產生的特殊語法現象，到唐代仍被譯師沿用，甚至脫離原典使用，如玄奘對句末“故”的使用就是如此^②。

元白話是元代特殊歷史條件下，蒙古統治者學習漢語的成果。元朝（公元1271-1368）蒙古人進入中原地區時，蒙古人的漢語能力，還不能完全突破雙方的語言障礙。如元世祖忽必烈，他在元代諸帝中以接受漢文化，“好儒術，喜衣冠，崇禮讓”^③著稱，有一定程度的漢語水準，但仍不能完全脫離翻譯，文獻記載，他在與儒臣許衡對話時，“先生每有奏對，則上自擇善譯者，然後見之。或譯者言不逮意，上已領悟；或語意不倫，上亦覺其非而正之”。^④ 這就使得蒙古人為了實施對中原地區的統治，必須學習漢語。1233年太宗窩闊台下詔于燕京文廟設立國子學，首批選擇十八名蒙古貴族子弟入學，習學“漢兒言語文書”，全真道士馮志亨擔任國子總教，由四名漢人教讀之。這批國子生徒後來“不惟俱獲重用，復以才德見稱於人”^⑤。在需要的壓力下，蒙古人以漢語為第二語言的不完全習得成果，過早地投入了實際的使用和交流，今天我們看到的元白話，就是當時使用的記錄。蒙古語的詞彙和語法特徵，在元白話裏比比皆是。我們從《元典章·刑部》所錄供詞的對比中也看到，元白話主要的使用者是蒙古人，王公貴族、官吏眷屬，社會地位越高，使用的元白話中，受蒙古語影響的特殊成分越多，越明顯。相反，在一般漢族百姓的供詞裏，基本上看不到蒙古語影響下的特殊語法現象的例子。這從另一個側面證明，元白話中特殊語法現象是蒙古人學習漢語的過程裏產生的，元代的特殊歷史條件、蒙古人的特殊社會地位，使得這些漢語學習者來不及，甚至不需要正確地掌握漢語，他們只要粗略地知道一些漢語詞彙，以一種簡單的蒙漢混合語法，就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傳達給一般百姓，完成其統治。正是這種特殊的社會條件，使得元白話得以保留相當多的蒙古語影響的特徵，更明確地顯示出第二語言初學者的特徵。

① 由於佛經原典的文獻缺失，早期（包括東漢三國）佛經翻譯的詳細情況目前研究者還不得而知。如遇（2006）和遇、曹（2007）所指出的，我們現在所見東漢譯經原典語言是什麼，現存梵文、巴利文文本和漢文文本之間是什麼關係也都存有需要進一步研究之處。但漢譯佛經與梵文等佛經之間存在來源關係是肯定的，通過對比確定二者語言上的關係也是有據可依的。我們的研究就是要從這些顯示出二者關係的語料上，找出佛經語言翻譯過程裏語言接觸的影響，進而討論其中所反映出的第二語言習得導致的語言接觸規律性特徵。

② 參閱遇、曹（2007）。

③ 《郝文忠公臨川文集》，陝西人民出版社，2006。

④ 寂照大師馮公道行碑，《元朝名臣事略》卷八《左丞許文正公》，中華書局，1996年。

⑤ 同注④。

3 中古譯經和元白話中的特殊語言變化

經過長期的研究，學者對中古譯經和元代的白話作品裏因為語言接觸產生的特殊語言現象，已經有了一個基本的瞭解。

研究者經常提及特殊語法現象見於中古譯經的主要有：

1) 複數表達法。2) 呼格。3) 被動式的使用。4) 表完成態的“已”。5) “S, N 是”判斷句。6) “取 OV”式狹義處置式。7) 語氣副詞“將無”。8) “云何”的特殊用法。9) 用於分句末的表原因的“故”。10) 漢語“除舍”排他標記。11) 反身代詞“自己”的來源。12) “若 A 若 B”結構的來源。13) “與……”的特殊用法。14) 並列成分後置。15) 後置定語及定語從句。

見於元白話的主要有：

1) 複數詞尾的特殊用法。2) 第一人稱複數代詞區分包括式與排除式。3) 方位詞充當各類語法標記。4) OV 語序。5) 句末使用表示肯定的語助詞“有”。6) 判斷詞後置與迭加式判斷句。7) 動詞“有”表示人或事物所在位置、處所。8) 使用引語標誌“麼道”。9) “像”義動詞後置的比擬式。10) 副詞的異常位置。

這些特殊現象主要是改變漢語的語序、句型，或者是引入漢語語法本身沒有的範疇。

佛經原典使用的梵文、巴利文等印歐語系語言都有格範疇，語序自然就不像漢語那樣起重要作用，像動賓關係從現存梵文、巴利文佛經看，就常常是採用 OV 語序，因此，我們在中古譯經裏，會看到 OV 語序的句子。如：

(1) 爾時，諸比丘白世尊曰：諸法之本，如來所說。唯願世尊為諸比丘說此妙義。
(增壹阿含經，卷第二^①)

例 1 中“諸法之本”是對“如來所說”性質的判斷，在句子裏用作表語，按漢語語序應該在“如來所說”之後，這裏却出現在前面，顯然不符合漢語的語序。

(2) 諸比丘亦可得安身，及時可向鞞羅國，到彼已，比丘當供食飯漿湯藥衣被。
(鼻奈耶，卷第一^②)

例 2 中“比丘”是“供”的對象，放在“供”之前是受到梵文原典的影響。

(3) 佛如是三語瞿婆離……時瞿婆離比丘佛三語不受。便從坐起而去。(同上，卷第四)
例 3 中“佛三語”是“不受”的賓語，顯然也是在原典影響下，被前置了。

在我們以上列舉的 15 類漢譯佛經特殊語法現象裏，類似的語序錯誤還有：

^① 《增壹阿含經》，《大正藏》NO. 0125。前秦曇摩難提誦出梵本，竺佛念傳譯，曇嵩筆受，後經道安、法和考正，僧契、僧茂助校漏失。後因譯文未能盡善，再由僧伽提婆加以修訂。

^② 《鼻奈耶》，《大正藏》NO. 1125。耶舍誦出梵本，佛提梵書，竺佛念譯，曇景筆受。

(4) 諸根澹泊。亦難陀比丘是。(增壹阿含經,卷第三)

“S, N 是”判斷句:漢語判斷句應為“是 N”,例句中“難陀比丘是”照搬了佛經原典語言的語序。

(5) 目連即前捉手將至門外,還取門閉,前白佛言:不淨比丘已將在外。(同上,卷第四十四)

“取 OV”式狹義處置式:佛經譯者按照梵文的規則,錯誤的省略了動詞“閉”後同指“門”的代詞賓語,導致了狹義處置式的產生。

(6) 女白佛言:唯然世尊,當受我請及比丘僧。(同上,卷第十)

並列成分後置:漢語並列成分緊靠着連詞,上例中“及”連接的兩項“世尊”“比丘僧”被“當受我請”隔開,譯者依從了梵文規則。

梵文等佛經原典語言裏,句型的表達方式與漢語不同,翻譯的過程裏,原典的句型表達方式也會出現在譯文中。如:

(7) 云何彼究竟者,為是有愛究竟? 為無愛究竟?(同上,卷第十九)

“云何”的特殊用法:漢語疑問句使用疑問詞(代詞、語氣詞)或語氣表達,在譯梵文為漢語時,譯者套用了梵文疑問句首 kim 的用法。

(8) 所以然者,意想著水故。(同上,卷第二十)

用於分句末的表原因的“故”:漢語表示原因使用前置介詞“因”,例中譯者在對譯梵文後置的表原因的格標記時不用“因”,而是在梵文格標記位置上使用了漢語表原因的名詞“故”。

(9) 閻浮裏內有德之人,無復過我,唯除如來。(同上,卷第二十八)

梵文裏有表達“除舍”範疇的標記,佛經譯者選擇漢語“排除/去除”義動詞“除”對譯梵文的“除舍”範疇,導致了漢語“除”從動詞到介詞的語法化過程。

以上我們列舉過 12 種元白話中出現的特殊語法現象,也是如此。如:

(10) 如今有的房舍、人口、田產、財物,應有的物件,胡總管的媳婦、孩兒根底分付與者。(元典章,刑部卷三)

OV 語序:例中“房舍、人口、田產、財物,應有的物件”是動詞“分付”的賓語,按漢語的語序,應該放在“分付”之後。但蒙古語是 OV 語序的語言,蒙古人學習漢語的時候,沒有完全掌握漢語的 VO 語序,元白話例出現了 OV 語序的句子。

(11) 因著胡家的氣力裏,做到參政的名分有,卻將他胡家的親子胡總管根底殺了有。(同上)

方位詞充當各類語法標記:漢語使用語序或前置的介詞表達對象、原因等,元白話則保留了蒙古語格系統的表達方式,選擇了一些漢語的方位詞,如根底、裏、上(頭)、行,加在名詞之後,承擔漢語裏語序或前置介詞功能。

(12) 殺胡總管時,和賊每一處入去來,不曾下手有。(同上)

句末使用表示肯定的語助詞“有”：元白話句末的“有”是對譯元代蒙古語裏特殊動詞 a-、bü-及動詞陳述式時體範疇，蒙古語助動詞用於動詞後，輔助表達時體意義。元白話中句末的“有”，照搬了蒙古語的用法。

(13)尋常的不是，有玲瓏花樣的。(古本老乞大)/五嶽……咱每的神祈(祇)有。
(一三〇六年霍州霍嶽廟令旨碑)/(你的師傅是什麼人?)是漢兒人有。(古本老乞大)

判斷詞後置與迭加式判斷句：元白話中一些判斷句保留了“N+是”的蒙古語語序，同時也出現了用“有”替代係詞“是”，以及“是”和“有”重疊使用的句子。

(14)“如今有的房舍、人口、田產、財物，應有的對象，胡總管的媳婦、孩兒根底分付與者。”麼道，聖旨了也。(卷三)

使用引語標誌“麼道”：蒙古語直接引語後要加標記，漢語沒有這樣的要求，元白話保留了蒙語的表達方式。

概言之，漢語史上兩次主要的語言接觸過程裏，在佛經原典語言和蒙古語的影響下，中古譯經和元白話中出現數十種語法改變，這些改變的機制、方式等可以做多種分析和分類，但這兩次語言接觸所造成的語法改變的主流，是把中古譯經原典和蒙古語的語序、句型和語法形式等複製到譯經和元白話中來，這一點在元白話中表現得尤為強烈。

4 從中古譯經和元白話看與第二語言習得 相關的語言接觸與語言變化

以上的材料和分析證明，中古譯經和元白話裏漢語出現的改變集中在語序、句型、語法範疇等基本語法要素上，這些變化的出現與變化產生的條件有關。

如我們反復強調的，中古譯經和元白話都是操其他語言的人學習漢語、是第二語言習得的結果，從語言習得的角度看，它們都是一種中介語。第二語言習得理論中所謂中介語，是指學習者在某一階段所建立起來的目的語知識系統，既包含母語的特徵，也包含目的語特徵。它不穩固，是逐漸變化的，在不斷的重組之中逐漸接近目的語。同時，在第二語言習得的中間階段裏，不完全習得錯誤的出現是有規律的。對比分析研究認為(1)語言間的句法結構差距越大，對學習者而言其結構的困難度就越高；(2)語言間的語義結構差距越大，對學習者而言其結構的困難度也越高。(陳 2007:78)^①這些高困難度語法、語義結構，也就是第二語言學習者難於掌握，易於出錯的語法點。

我們在前面的分析中指出，中古譯經和元白話中的特殊語法現象，就是他們把佛經原典和蒙古語的語序、句型、語法範疇等特徵保留了下來，這些特徵正是梵文、蒙古語在表層上與

^① 參閱遇笑容(2011)。

漢語有明顯差距之處。第二語言習學者在學習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受到母語影響，在與目的語差別最大的語法特點上，出現學習的錯誤，帶進習得的目的語裏。也就是說，中古譯經和元白話裏特殊成分的出現，是受到第二語言習得規律的制約。

Thomason(2001)^①在討論語言接觸時就曾經注意到：語言接觸造成的語言改變一種是由以那種語言為母語的人帶入到該語言的，另一種是由不完全習得接受語言（也就是第二語言習得的結果）而把其學習的錯誤帶入接受語中。

所謂第二語言習得導致的語言接觸是指人們在學習第二語言的過程中，由於不完全習得，把母語干擾下出現的學習錯誤帶進了目的語，從而造成了目的語的改變。

漢語史裏兩次主要的語言接觸都是與第二語言習得有關的，中古譯經和元白話都是由非母語使用者，在不完全習得的情況下，把母語的句式、語序等帶進了接受語——漢語。中古的西域僧人和元代的蒙古人並沒有很好地學習和掌握漢語，在粗略地學習之後，實際需要就讓他們使用其習得的中介語進入交流，而譯經傳播的信仰和蒙古人的政治權利，給他們的中介語帶來很高的地位，使他們的中介語特殊語法形式得以在當時局部的社會環境（佛教信徒和元代的部分蒙古人和接近蒙古統治者的人群）中使用和傳播。

中古譯經和元白話裏的中介語錯誤產生的基本方式是複製。

Heine & Kuteva(2005)在討論語言接觸造成的語言改變時，把由語言接觸引發的語言變化分為借用和複製兩種，“借用”是指形式或者音-義單位轉移的過程，包含接觸導致的某種語音形式的轉移。“複製”則是一種創新機制，是指複製語(Repleca language, 簡稱 R)的使用者利用自己語言裏可得到的語言材料，仿照模型語(Model language, 簡稱 M)的特定模式，在其語言裏產生出一個新的意義或結構^②。

第二語言習得導致的語言接觸與 Heine & Kuteva 討論的對象不同（他們將討論限定於“由以那種語言為母語的人帶入到該語言的”接觸），但如果我們可以套用其公式，在第二語言習得導致的語言接觸中，除“借用”（指形式或者音-義單位轉移的過程，包含接觸導致的某種語音形式的轉移）外，“複製”（也就是除借用外的其他變化）是：

模型語(M)的使用者利用複製語(R)裏可得到的語言材料，仿照模型語(M)的特定模式，在複製語(R)裏產生出一個新的意義或結構。

在中古譯經和元白話裏，佛經譯者和元代的蒙古人正是仿照梵文、蒙古語的模式(M)，利用習得的漢語(R)材料，在他們各自的漢語中介語裏(R)，產生出新的語序、句型和語法範疇。

兩種語言接觸雖然都通過複製來實現語言改變，但由於這種“改變”的主體(施動者)不同，改變的對象和方式是有所區別的。在與第二語言習得有關的接觸裏，改變的主體從模型

① 參閱 Thomason(2001), 第 6 章。

② 參閱 Heine & Kuteva(2005)和 Heine(2008)。

語出發,把自己母語裏的成分複製到複製語裏,從中古譯經和元白話看,其複製的對象是自己母語裏一些和漢語有本質區別的成分,如語序和特殊句式。類似的情況在不與第二語言習得相關的語言接觸中,並不常見。^① 複製的語序和特殊句式是他們母語中的一些基本、常用特徵,就其產生而言,複製只是填入漢語裏他們覺得相同、相近的材料,這種複製一般是一個簡單的結果,而不是一個複雜的演化過程。但通過複製產生的這些語法成分從出現到通過協商被複製語接受,則是一個漫長且困難的過程。

第二語言習得產生的中介語在一般條件下應該會不斷地修正錯誤,趨近目的語,但也會有些被複製進來的錯誤,最後被複製語接受,成為複製語的一部分,如我們在第三節中提到的漢語狹義處置式、完成態表示法、排除範疇等。同時我們也注意到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下,也會出現第二語言習得中複製語的複製成分保留並穩定發展的情況。現代甘肅的臨夏、唐汪,青海的甘溝等地區漢蒙藏諸民族雜居,漢語和藏緬語、阿爾泰語系語言長期接觸,這幾個地區的方言裏,元白話中常見的OV語序、名詞的格系統、引語標記等語法現象廣泛存在。在元末明初開始出現的伊斯蘭教清真寺中講解《古蘭經》使用的“經堂語”中,也經常使用OV語序、名詞的格系統等。這些現象的存在證明了第二語言習得導致的語言接觸造成語言改變的另一種可能。

所以,第二語言習得導致的語言接觸,會通過複製模型語把新的語序、句型和語法範疇引入複製語。這些成分出現的原因是母語干擾,產生的方式是複製,產生的結果是在共時平面上局部地改變複製語,並在歷時發展上為複製語提供了多種可能性。^② 中古譯經和元白話在漢語史中即是如此。

概括地說,從中古譯經和元白話看漢語語法史中的語言接觸的主要特徵是:

- 1) 中古譯經和元白話都是第二語言習得中由來源語使用者改變接受語的語言接觸;
- 2) 第二語言習得的條件制約下,兩次語言接觸都把不完全習得造成的語法錯誤,帶進了接受語。這些錯誤常常是模型語(M)和複製語(R)之間差異最大的成分;
- 3) 錯誤產生最常見的方式是複製,所謂複製,是指以模型語(M)的語法形式,包括語序、句式、語法範疇等,用複製語(R)的材料,在複製語(R)中重新構建;
- 4) 特殊社會歷史條件可能會造成這些語法錯誤得以長期使用。

所以,語言接觸研究首先要區分的是誰是造成改變的主體,主體是複製語的使用者還是模型語使用者,會對語言接觸的許多問題有決定性的影響。過去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主體是複製語的使用者引發的語言接觸上,忽略了模型語使用者在第二語言習得中造成的語言接觸,這使得許多特殊現象得不到正確的解釋。

① 參閱 Heine(2008)。

② 參閱曹廣順(2015)。

參考文獻

- 曹廣順 2013 《西北方言特殊語法現象與漢語史中語言接觸引發的語言改變——以“格”範疇為例》，《歷史語言學研究》(第五輯)，北京：商務印書館。
- 曹廣順 2015 《從歷時與共時的不同視角看中古譯經和元白話的語言性質》，《北方漢語中的語言接觸——歷時與共時研究》，CRLAO, 2015, 巴黎。
- 曹廣順 陳丹丹 2009 《元白話特殊語言現象再研究》，《歷史語言學研究》(第二輯)，北京：商務印書館。
- 曹廣順 遇笑容 2000 《中古譯經中的處置式》，《中國語文》第6期。
- 曹廣順 遇笑容 2010 《中古譯經、元白話語法研究與語言接觸》，《漢語史學報》(第十輯)，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曹廣順 遇笑容 2014 《變與不變》，《歷史語言學研究》(第八輯)，北京：商務印書館。
- 陳俊光 2007 《對比分析與教學應用》，臺北：文鶴出版有限公司。
- 胡敕瑞 2008 《漢語負面排他標記的來源及其發展》，《語言科學》第6期。
- 胡敕瑞 2010 《漢譯佛典中的一類特殊句式：並列成分後置》，《語言科學》第9期。
- 江藍生 2003 《語言接觸與元明時期的特殊判斷句》，《語言學論叢》(第二十八輯)，北京：商務印書館。
- 蔣紹愚 2001 《〈世說新語〉〈齊民要術〉〈洛陽伽藍記〉〈賢愚經〉〈百喻經〉中的“已”“竟”“訖”“畢”，《語言研究》第1期。
- 蔣紹愚 2008 《語言接觸的一個案例——再談“V(O)已”》，《語言學論叢》第三十六輯，北京：商務印書館。
- 蔣紹愚 2009 《也談漢譯佛典中的“NP1, NP2+是也/是”》，《中國語言學集刊》第三卷第二期，北京：中華書局。
- 遇笑容 2006 《梵漢對勘與中古譯經語法研究》《漢語史學報》，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遇笑容 2008 《理論與事實：語言接觸視角下的中古譯經語法研究》，《漢語史學報》(第七輯)，北京：上海教育出版社。
- 遇笑容 2011 《試用對比分析看〈老乞大〉中的特殊語言現象》，《歷史語言學研究》(第四輯)，北京：商務印書館。
- 遇笑容 曹廣順 2007 《再談中古譯經與漢語語法史研究》，《漢藏語學報》(第一期)，北京：商務印書館。
- 遇笑容 曹廣順 2013 《〈訓世評話〉中的特殊語言現象及其語言性質》，《歷史語言學研究》(第六輯)，北京：商務印書館。
- 朱冠明 2007 《漢譯佛典語法研究述要》，《漢譯佛典語法研究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
- 朱慶之 2001 《佛教混合漢語初論》，《語言學論叢》(第二十四輯)，北京：商務印書館。
- 祖生利 2001 《元代白話碑文中方位詞的格標記作用》，《語言研究》第4期。
- 祖生利 2003 《〈元典章·刑部〉直譯體文字中的特殊語法現象》，《蒙古史研究》(第七輯)，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
- 祖生利 2007 《元代的蒙式漢語及其時體範疇的表達——以直譯體文獻的研究為中心》，《國外語言學》第1期。
- 祖生利 2011 《古本〈老乞大〉的語言性質》，《歷史語言學研究》(第四輯)，北京：商務印書館。
- Heine, Bernd 2008 Contact-induced word order change without word order change. In Peter Siemund & Noemi Kintana (eds.) *Language Contact and Contact Language*. 33 - 60.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

pany.

Heine, Bernd & Tania Kuteva 2005 *Language Contact and Grammatical Chan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homason, Sarah G. 2001 *Language Contact: An Introduction*.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Language Contact Caused by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 Study from the Translated Chinese Buddhist Texts of the Medieval Period and *Yuan baihua*

CAO Guangshun YU Xiaorong

Abstract: The two major language contacts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volve the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Buddhist texts in the Medieval period and *Yuan baihua*. Both contacts are related to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dozens of linguistic changes arose during the contacts. The basic mode leading to linguistic change is duplication of the most distinctive syntactic features of the model language. Language contact caused by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types in the study of language contact; its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are salient, and it is an important subject within the study of language contact that should be given more attention.

Key words: historical Chinese syntax, language contact, language change,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曹廣順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 100732;
遇笑容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中古譯經由原典呼格的對譯 所帶來的句法影響

趙長才

提 要 中古時期佛經的翻譯者在將原典語言翻譯為漢語的過程中，對原典語言呼格成分的位置處理得往往比較靈活，這樣一來，給漢語的句法帶來了一些具體影響，甚至影響到對句子的理解。這些影響有的體現在單句層面，造成句子成分之間的割裂；有的體現在複句層面，使得複句的關聯標記與其所標記的從句隔開；還有的甚至超出了句法層面，在語用層面上對話題結構發生影響。

关键词 中古漢譯佛經 語言接觸 呼格 句法影響

一 引言

梵文名詞有八個格，第八格是“呼格”，如“世尊告曰：‘止，族姓子！仁等無乃建發是計……’（竺法護《正法華經》，9/110b）”朱慶之（2001：13）認為這種“族姓子”作為插入語的用法漢語中罕見，是原文呼格的對譯。（朱冠明《中古佛典語法研究概況——20世紀國內佛教漢語研究回顧之二》）

學者們注意到了中古漢譯佛經對應於原典呼格的對譯現象，但是對原典呼格成分譯為漢語後的位置以及由此所帶來的一些句法影響，目前尚缺乏較為具體全面的考察，本文擬對此做初步的探討。

二 漢譯佛經中呼格用於起首位置的用法與 漢語自身固有表達方式的一致性

漢譯佛經中的呼格常用於起首位置（對譯的呼格成分以下畫綫標示，下同），如：

(1) 佛言：“阿難，我宿命時，布施如是。用一切人故，不惜身命，至無數劫，無有恨悔，無所榮冀，自致正覺，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三國吳康僧會譯：六度集經，卷2）

(2) 王聞是語，心生歡喜，復作是言：“大師，我等若能如是行法，所修善法則為不損。”（三國吳支謙譯：菩薩本緣經，卷上）